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 的特色及其影響

田啟文*

【提要】

臺灣古典散文的發展，萌芽自明鄭時期，至清治時期蓬勃發展，並且延續到日治時期以至於現代。其中由於明鄭國祚甚短，清治時期可謂臺灣古典散文的黃金時代，不論質與量上，都非常可觀。其中遊宦文人所創作的散文作品，在臺灣古典散文史上，更具有奠基者與啟蒙者的地位。晚明清初之時，臺灣地處海外，文化發展遲緩，此時遊宦文人便扮演著啟發臺灣本地文人的角色，教導與引導臺灣本地文人，所以要了解臺灣古典散文的面貌，從遊宦文人的作品入手，是正確而必要的。了解遊宦散文的特點後，再來審視臺灣本地文人的散文面貌，就非常容易切入。而且在了解遊宦散文特色的同時，其不足之處也會相對地呈顯出來，此時本地文人的散文作品，其因襲與革新之處便洞然可知了。基於上述原因，本文企圖從清治時期遊宦散文的特色與影響兩方面入手，希望解開臺灣古典散文生根與植基時期的發展及得失狀態，以及對於後世文學乃至於文化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臺灣文學 臺灣古典散文 臺灣文化 遊宦文學

* 興國管理學院文教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臺灣文學的發展上，從明鄭到清治時期，屬於古典文學的形態，其中數量最多的是詩歌，其次是散文。在散文的研究部分，除了專家文的探討外，從時間縱深的角度切入，探討文學發展的因果脈絡，也是一個重要方向；又或者從作者的本質上進行區分（如分為遊宦文人、本地文人），再分析其各自的創作特色，也是一條可以探索的途徑。本文的研究，企圖以遊宦文人的散文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散文之特色及其所造成之影響。這樣的研究，其基礎是建立在作者的地理區域及職業身份的差異上。因為遊宦文人一來具有官方身分，二來祖籍地在大陸而非臺灣，這兩點本質和臺灣的在地文人有所差異，此一差異造成其散文的形式與內容上展現了相當程度的特色，而這些特色也對臺灣的文學以至於文化上產生了若干層面的影響。如此的特色及影響，實為研究臺灣文學的重要課題，它幫助我們掌握臺灣古典散文一部分的區塊（另一區塊為臺灣本地文人的散文作品），此一問題如果獲得解決，將能進一步和臺灣本地文人的散文進行比較，雙方的作品特色一旦明朗，則臺灣古典散文的面貌便能有一主幹性的呈現。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作品，目前看得到的文獻，大抵保存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之中。另外有一部分遊宦文人的作品，因年代久遠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已難以窺見，這必須仰賴進一步的田調蒐羅，才能有所發現。本文的論述，最好的狀況是等更多的田調資料產生後，配合《臺灣文獻叢刊》一齊做為研究的材料。然而眾所周知的，田調工作極耗時日，而且無法確切掌握資料問世的時間，基於學術研究上的需求性與迫切性（清代臺灣遊宦散文為臺灣古典散文的源頭，是以有研究上之迫切需要），本文就先以《臺灣文獻叢刊》的作品為研究材料，日後若有關鍵性的遊宦散文出現，再另行補入。

綜觀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創作，其特色大致表現在文學類型、情感傳達和文化觀點這三個層面上；至於其影響的部分，則有擴大中原人士對於臺灣的認識、促進臺灣政教的推動、引導後代臺灣古典散文的寫作、提供臺灣方志的撰述材料、對原住民文化造成衝擊等五方面。以下

且分項敘述之。

二、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的特色

(一) 文學類型之特色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在文學類型的發展上，主要特色是記敘性散文和實用性散文十分發達；說理性散文雖然也有，但數量甚少，難以和前兩類相比。^①基於此一現象，本文便針對記敘性散文和實用性散文進行分析，至於說理性散文，則不作討論。

1. 記敘性散文：以日記式與筆記式散文為主

所謂記敘性散文，是指記載描寫人、事、景、物的散文者稱之。它可以包含敘事、傳記、雜記、遊記與筆記等。其中的遊記，除了單篇式遊記外，還包含了日記式遊記，所以日記式散文也屬於記敘性散文的一支。

在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書寫，存在著許多記敘性的文章。遊宦文人以此來描寫臺灣的人事物，記載臺灣的風俗民情，將他們所見所聞透過此類作品進行記錄與傳達，一方面達到抒發情感的目的，一方面也完成資料的儲存工作。

^① 本文對古典散文體類的分類，乃參考陳必祥、王更生、馮永敏諸人之說而來。陳必祥在其《古代散文體類概論》一書中，針對古人的文體分類進行探討，從曹丕《典論·論文》到清代姚鼐《古文辭類纂》的分法，都進行利弊得失的分析。此外，他也對近人（如陳望道、葉聖陶、王力……）的分類法進行品評，最後提出自己的觀點，以記敘性散文、說理性散文、實用性散文等三大類，總括古典散文的體式。在這三大類底下，再區分綱與目，例如「實用性散文」底下，分為書信、序跋、贈序、公牘、碑誌、哀祭、箴銘諸網；接著，於此諸網之下再細分目，如「公牘」一網之下，又分為詔令、奏議、檄移等目。陳氏的分法，雖然不是盡善盡美（綱與目的部分較疏略），但在這種「類、綱、目」三層式結構的排列下，古代的散文體式已多半能囊括進來，看起來條理清晰，同時容易理解與掌握。所以雖然他不像姚鼐將古文分成十三類，感覺起來比較精細，但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便可了解，陳氏的分法實有以簡御繁的效果，姚氏的十三類分法，除了「辭賦」類之外，其餘十二類都能依其性質歸入陳氏的三大散文類型裡；此外，連姚氏分類法中未予歸入的散文體式（如日記式散文、正史中的傳記等等），也能歸入陳氏的三大散文類型中。因此，陳氏將古代散文概分成三大類，看似粗疏，但經過底下綱與目的細分，古典散文的體類已大致囊括。這種以簡御繁的分類法，近代學者也經常採用，如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分古代文章為韻文、析理、記事三類；陳望道《作文法講義》分為記載文、記敘文、解釋文、論辯文、誘導文五類；蔣伯潛《體裁與風格》分為議論、抒情、說明、記述、描寫五類，這都是採用以簡御繁的分類法，將紛雜的文章體式，統攝於少數類型之中。因此陳必祥的三類式分法，符合此種以簡御繁的分類趨勢。而且陳氏的觀點，乃參酌古今諸家說法後的產物，立論上較為客觀可行。之後王更生〈論我國古今散文體類分合之價值原則及方法〉、馮永敏《散文鑑賞藝術探微》中，便依據陳必祥的觀點進行古典散文的分類，三大類的形態維持不變，不過在綱與目裡，進行了增添調整，改善了陳氏在綱與目上區分較為疏略的弊病，讓這種分類法更為詳備可用，至此各體古典散文，幾乎都能在這三大類型中找到適當的位置。今本文對於古典散文的分類，即參酌陳、王、馮三家之說而來。

在這些記敘性散文中，若依內容來看，大抵屬於史料的記載，而且是以日記體或筆記體的形態出現，至於純粹記人、敘事、寫景、狀物等單篇式記敘文雖然有，但數量較少，它們大抵保留在別集或方志、採訪冊之中。就別集的部分來看，藍鼎元《東征集》、姚瑩《東溟文集》、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鄭兼才《六亭文選》、周凱《內自頌齋文選》、翟灝《臺陽筆記》、鄧傳安《蠡測彙鈔》等書中皆有收錄。至於方志之中，高拱乾《臺灣府志》有 6 篇，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中有 14 篇，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有 3 篇，周鍾瑄《諸羅縣志》有 2 篇，陳文達《鳳山縣志》有 1 篇，陳培桂《淡水廳志》有 3 篇，周璽《彰化縣志》有 8 篇，柯培元《噶瑪蘭志略》有 1 篇，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有 5 篇，陳文達《臺灣縣志》有 2 篇，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有 1 篇，《新竹縣志初稿》中有 1 篇，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中有 3 篇。從以上所列別集或方志中來看，收有若干單篇式記敘散文，這些散文或記人，或敘事，或寫景，或狀物，都表現了不同的藝術風味。不過這些單篇式記敘性散文數量實在偏低，我們不要看上頭所列的清單似乎洋洋灑灑，其實和其他類型的散文比較起來，它的數量真的不多。就以別集為例來說，鄭兼才《六亭文選》收有 7 篇，看起來似乎不少，但相較於它所收的 57 篇實用性散文（含公牘文與日常實用文），比例上顯然太低；再看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收有 7 篇，但其實用性散文卻有 104 篇，比例上又更低了。由以上兩件別集的例子來看，單篇式記敘性散文數量真的不多，這還不包括有些別集中連一篇都沒有（如陳璘《陳清端公文選》），數量之少，由是可知。看完別集的例子，我們再以方志中收錄的數量為例進行說明。方志中以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收 14 篇最多，但其實用性散文卻高達 53 篇；又周璽《彰化縣志》收有 8 篇，數量也不少，但其實用性散文的卻有 46 篇。由以上兩部方志的收錄比例來看，單篇式記敘性散文數量之少，可見一斑。尤其許多作品被重覆收錄，例如高拱乾〈澄臺記〉收錄於《臺灣府志》中，但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等書中亦收。除了方志彼此重覆收錄外，許多方志中收錄的文章同樣重見於別集之中，例如藍鼎元〈紀竹塹埔〉一文，陳培桂《淡水廳志》有，而藍氏個人的《東征集》中也有；再如鄧傳安〈遊水裏社記〉一文，周璽《彰化縣志》中有收，而鄧氏個人的《蠡測彙鈔》亦收。由此一情形來看，這些單篇式的記敘性散文，數量肯定比上述所列的更少。不

過儘管數量不多，但其中仍不乏筆致高妙的優秀作品，如高拱乾〈澄臺記〉（《臺灣府志》），陳夢林〈望玉山記〉、〈九日遊北香湖觀荷記〉（《諸羅縣志》），藍鼎元〈紀水沙連〉、〈紀荷包嶼〉（《東征集》），姚瑩〈噶瑪蘭廳異記〉（《東溟文集》），鄭兼才〈伯父斗山先生家傳〉〈三兄澹軒家傳〉（《六亭文選》），翟灝〈聚芳園記〉（《臺陽筆記》）……等等，都是令人吟詠再三的佳作，值得我們用心閱讀。

綜上可知，在別集或方志中雖收有許多單篇式記敘性散文，但比起實用性散文而言，數量顯然偏低，不足以成為遊宦散文中的顯性特徵。我們在前頭中已經說過，在清治時期的臺灣遊宦散文裡，記敘性散文表現得較為鮮明與亮眼的，當屬史料記述性質的作品，而且其表現形式常以日記式或筆記式的形態出現，這不能不說是當時記敘性散文的一項特色，以下便針對此一現象進行分析。

（1）日記式散文

所謂日記式散文，是指文章的體製形式乃採用年月日的編排方式進行書寫的。作者將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依日期逐次進行記載陳述，短者數日、長者數十年都有，體製長短變化不一。這類散文，興起於中國南宋時期，如陸游的〈入蜀記〉、范成大的〈吳船錄〉等，都是相當有名的篇章。這類日記式散文在南宋之後仍然持續地流布，尤其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堪稱此類散文的經典之作。它是作者三十餘年的遊歷日記，不僅描繪地理景觀、山水風光，也記述風俗民情甚至考證故實，其散失者不計，光目前僅存傳世者即有六十餘萬言，其體製之宏偉不言可喻，清代錢謙益稱它為「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日記式散文在清代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作品裡，佔有相當的數量，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郁永河的《裨海紀遊》。郁永河在清康熙三十六年陰曆正月二十四日出發來臺灣，目的是為了開採硫磺，以補充福建火藥局發生爆炸後的硫磺需求。歷經約九個多月的時間，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終於不辱使命，完成硫磺的採集，在陰曆十月十二日離臺回中原復命。這本散文集的內容，採日記式的形態寫作，歷述在臺灣的所見所聞，包括地理形勢、採硫情況、風俗民情、氣候、生物、特產等等的描寫，可作為了解當時臺灣景象的最佳素材，也正因如此，後來許多文人書寫臺灣每每引用此書的材料，如另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臺海使槎錄》便多處徵引郁氏之書。以下我們且援引一段《裨海紀遊》

的文字，以明白日記式散文對於臺灣事物之描繪情況。其文曰：

十一日，行三十里，至半線社，居停主人揖客頗恭，具饌尤腆。云：「過此多石路，車行不易，曷少憩節勞？」遂留宿焉。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皙妍好者。

十二日，過啞束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

十三日，渡大溪，過沙轆社，至牛罵社。社屋隘甚，值雨過，殊濕。假番室牖外設榻，緣梯而登，雖無門闌，喜其高潔。

十四日，陰霾，大雨，不得行。午後雨止，聞海吼聲，如錢塘怒潮，至夜不息，社人云：「海吼是雨徵也。」

十五日、十六日，皆雨，前溪新水方怒，不敢進。②

這段文字記載了永河行經彰化、臺中一帶的情景。日期從十一日依序記載至十六日。由是得知，日記式散文的寫作模式，乃逐日載記所見所聞之事。再看另一位遊宦文人蔣師轍的作品－《臺游日記》，其文曰：

四月一日癸丑，擬取嘉義招覆童卷二十六本。日埔，大風，是日覆試一等生文。

二日，晨閱府學覆試生卷，甲乙略有逸置。是日覆試諸縣童文，凡三題，皆作小講。午後得卷，視前尤遜，遴其筆致稍清者，嘉義十四名，撥府三名，澎湖一名，撥府一名，皆如額。澎湖府試首卷最劣，中丞斥之，臺南文試畢。

三日，試臺灣府生童經古，郭僕昨夕購得檳榔扇數握，以一進余，狀極質樸，戲銘之曰：「仁頻嘉果，擷秀炎方。舊製書軸，曾僞錦郎。待時而動，厥用彌減。宣揚仁風，斯民以康。」晚閱生卷，鄙俚過於臺南，擬正取六卷。

②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卷中，頁19。

四日，試生文。日夕分得府學六十四卷，題為植其杖而耘至隱者也，擬取一等六卷，備數而已。

五日，風，午後大雨，覆校擯落生卷，蕪穢滿眼，知無匿秀矣。是日覆試生童經古。^③

蔣師轍在清光緒十八年時，應臺灣巡撫邵友濂之聘來臺擔任閱卷官員，此書乃記載其於二月由天津搭船啓程至臺，以迄九月離臺之事。本文所引的此段文字，乃作者在四月份於臺南閱卷時的一段載述，文中提到他閱卷的情形，也談到各地考生的素質差異，並且雜述他得到一把檳榔扇的心情。

這種日記式的散文，在清代遊宦文人的作品中經常出現，除了上述所引外，還有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曹士桂《宦海日記》、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池志徵《臺灣遊記》、胡傳《臺灣日記》等等，茲依年代先後列表如下。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日記式散文一覽表

作者	書名	備註
郁永河	裨海紀遊	別名《採硫日記》
朱仕玠	小琉球漫誌·泛海紀程	
曹士桂	宦海日記	
徐宗幹	斯未信齋雜錄	此書乃日記式散文與筆記式散文之混合
羅大春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池志徵	臺灣遊記	
蔣師轍	臺游日記	
胡傳	臺灣日記與稟啓	此書為日記式散文與公牘文之混合
俞明震	臺灣八日記	

日記式散文之所以受到清代臺灣遊宦文人的廣泛運用，筆者認為當有以下兩點原因：第一，從南宋以來，此體散文一直廣受文人喜愛，尤其晚

^③ 蔣師轍：《臺遊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卷1，頁16-17。

明《徐霞客遊記》的耀眼成就，更激起清代文人對此體散文的高度重視，在此一情況下，運用此體以記述遊臺事跡，亦屬理之當然。第二，日記式散文依日期先後為序進行撰寫，條理清晰分明，而且各類事物皆可陳述，不受固定主題之限制，即使瑣碎事物亦可載記，相當適合遊宦期間條記每日所見所聞之事。

（2）筆記式散文

筆記文學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有，當時屬於志人與志怪之小說，如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劉義慶《世說新語》等。唐朝筆記則大致有兩類：一為傳奇小說，一為記錄史料瑣聞的散文；前者如牛僧孺《玄怪錄》，後者如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唐國史補》等。到了宋代，筆記式散文大盛，有記載史料者，如鄭文寶《南唐近事》、歐陽脩《歸田錄》、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有記載風俗民情者，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有記載藝文者，如羅大經《鶴林玉露》、洪邁《容齋隨筆》。宋代之後，筆記體散文持續地傳播，元、明、清三朝之文人，以此體寫作者眾，其間也出現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如元陶宗儀《輟耕錄》、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顧炎武《日知錄》、清王士禛《池北偶談》等等。綜觀這些筆記散文的作品，其內容包羅萬象，舉凡歷史瑣聞、文學藝術、風俗民情、地理景觀、經濟科技……等等，無所不談，是了解古代文化非常有力的資料。而其表現形式，除了一般性的記載描述外，也有兼及考證者，讓此類散文具有更深一層的學術內涵。

清代臺灣遊宦文人的筆記式散文數量也相當可觀，它主要的內容大致有歷史資料、瑣聞逸事、風俗民情、地理景觀、氣候物產等等。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當推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黃叔璥是順天大興人，康熙年間進士，他在康熙六十一年時以御史身分來臺巡視，在親身走訪臺灣各地後，寫成《臺海使槎錄》一書。此書分八卷，一至四卷為〈赤嵌筆談〉，五至七卷為〈番俗六考〉，八卷為〈番俗雜記〉。其中〈赤嵌筆談〉以臺灣整體人事物為對象，〈番俗六考〉與〈番俗雜記〉則以原住民為描寫對象。整本書所觸及的範圍，涵括地理形勢、風俗民情、制度、氣候、建築、器具、物產、藝文、歷史等等，可謂無所不包。尤其書中對於原住民的描寫，是今日我們研究原住民早期文化的重要資料。如其〈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瑯嶠十八社三·居處〉一文云：

築厝於巖洞，以石為垣，以木為梁，蓋薄石板於厝上，厝名打包。前後栽植檳榔、萋藤，至種芋藝黍時，更於山下豎竹為牆，取草遮蓋，以為棲止，收穫畢，仍歸山間。^④

這段文章將清代鳳山縣若干原住民的室居文化，做了扼要的記載，讓我們了解其房舍之形態以及居住的習慣，資料相當的實用且珍貴。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也是一本重要的筆記散文，董天工在乾隆年間來臺擔任彰化縣教諭，前後約四年時間，對於臺灣的山川景物、民情風俗有廣泛性的了解，於是寫下《臺海見聞錄》一書。此書共分二卷，前卷述山川建置與制度稅賦之事，後卷則述風俗民情與鳥獸草木。今且援引一段文字，以見其梗概，〈番石榴〉云：

番石榴，俗名莉仔茛，郊野遍生，花白頗香，實稍似榴，雖非佳品，臺人亦食之，味臭且澀，而社番則皆酷嗜焉。^⑤

這段話記載了清治時期臺灣番石榴的生長狀況與人們食用的情形，文中說番石榴「味臭且澀」、「非佳品」，可知臺灣早期番石榴並不是一項受歡迎的水果。不過文中又說：「社番則皆酷嗜焉」，可知在原住民的飲食上，番石榴是一項重要食物。

除了上述二書外，林謙光《臺灣紀略》、徐懷祖《臺灣隨筆》、丁紹儀《東瀛識略》、唐贊袞《臺陽見聞錄》、朱景英《海東札記》、陳盛韶《問俗錄》……等等，也都是筆記散文的重要著作，針對臺灣的各項事物進行載述。由是可知，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文人的記敘性散文中，筆記體是相當普遍的文類。這種文類在當時能夠流行於遊宦文人之間，主要還在於它記載事物的便利性所致。筆記散文記述的內容廣泛，所見所聞皆可入文，不拘題材，而且行文以通達為主，不嚴求章法段落、布局謀篇之技巧，書寫起來極為方便，是一種適合用於載記資料的散文體式。

④ 黃叔職：《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卷7，頁156。

⑤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卷1，頁5。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筆記式散文一覽表

作者	書名	備註
季麒光	臺灣雜記	
林謙光	臺灣紀略	
徐懷祖	臺灣隨筆	
黃叔璥	臺海使槎錄	
陳倫炯	海國聞見錄	
董天工	臺海見聞錄	
朱仕玠	小琉球漫誌·海東臚語	
朱景英	海東札記	
姚瑩	東槎紀略	此書有筆記式散文、仿紀事本末體散文、公牘文
陳盛紹	問俗錄	
丁紹儀	東瀛事略	
徐宗幹	斯未信齋雜錄	此書為日記式散文與筆記式散文之混合
林豪	東瀛紀事	
唐贊袞	臺陽見聞錄	

除了上述日記式與筆記式散文外，遊宦文人所作的記敘性散文，還有一種仿史書紀事本末體而成書者，這類書籍屬於敘事散文，較早出現者為藍鼎元《平臺紀略》，所記為朱一貴起兵叛變之事，其後又有楊廷理《東瀛紀事》、林豪《東瀛紀事》等書，前者記林爽文之亂，後者記戴潮春之亂。此外姚瑩《東槎紀略》中，有一部分文章亦可歸入此類散文。這類作品數量雖然較少，無法成為主要流派，但也是清代臺灣遊宦散文的一支，而且後來影響臺灣本地文人如吳德功、洪棄生等人的寫作模式，因此略作陳述，以為參考。

2. 實用性散文：公牘文與日常實用文皆有

所謂實用性散文，顧名思義就是具有濃厚實用色彩的散文稱之。馮永

敏將其分爲公文與日常實用文二種。^⑥公文（或稱公牘文）屬於官方文章，用以處理公務，主要有詔、誥、諭、令、檄、章、奏、議、上書、對、策、彈章、疏、表等等；日常實用文則是文人用於處理平時的個人性事務，常見於人情往來的酬應上，如書信、贈序、序跋、哀祭、碑誌等等的作品；或是用以警惕、勉勵、稱揚之作，如頌贊、箴銘等等。

在清代臺灣遊宦文人的作品中，實用性散文數量很多，它屬於單篇式的散文，除了方志中收錄一部分外，大抵保存在別集或總集中。在這些實用性散文裡，官方文書所佔比例尤高，主要是管理臺灣政務之需要而寫的。例如清康熙年間兩度至臺灣任職的陳瓚，其〈條陳臺灣縣事宜〉一文，向長官提出了十二點建議，希望強化臺灣縣的政治措施，其十二點建議依序爲「文廟之宜改建，以重根本也。」「宜興各坊里社學之制，以廣教化也。」「宜定季考之規，以勵實學也。」「宜舉鄉飲之禮，以厚風俗也。」「臺倉積粟之宜以時斂散也。」「澎湖孤懸海島，宜通商販粟以濟軍民也。」「水丁名色之宜永遠革除，以甦民困也。」「每歲修倉之宜永禁派累，以惜民財也。」「在坊小夫之宜革，以安商旅也。」「每歲二丁派買豬羊之宜禁，以除陋規也。」「兵民雜處之宜分別，以清保甲也。」「宜逐游手之徒，以靖地方也。」^⑦這十二點建議包括教育、風俗、倉粟、商賈、軍政、治安等等之事宜，多面性地提出治理臺灣的方法。接著我們來看徐宗幹的文章。徐宗幹在道光二十八年來台擔任分巡臺灣道，其《斯未信齋文編》中，十之八九是實用性散文，其中公文尤多。試看其〈全臺紳民公約（三）〉一文：

臺北淡水、雞籠山一帶，為合境來龍，靈秀所鍾，風脈攸繫。近聞有沿海奸匪，訛言山根生有煤炭，難保無偷挖漁利之徒，一經傷損，於全臺人民不利。合亟公立禁約，如遇前項挖煤奸徒，即行圍捕送官，倘敢抗拒，格殺勿論。或內地及各處商販前來購運，大眾協力阻止，若強行開採，富者出資，貧者出力，萬人一心，為全臺保護山脈。有不遵者，公議懲罰。此約。^⑧

這篇文章是徐宗幹爲防止匪徒盜挖煤炭所立的禁制令，文中要求全臺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遏阻宵小破壞臺灣的山林礦產。

^⑥ 見馮永敏：《散文鑑賞藝術探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頁110-125。

^⑦ 陳瓚：《陳清端公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1-11。

^⑧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32。

除了盜挖礦產外，清代臺灣時常受到外國勢力的騷擾，如道光二十一年就發生英國船隻攻擊基隆的事情，當時臺灣與英國開戰，姚瑩時任臺灣道，與參將邱鎮功等人竭力防守，進而打敗英人，當時姚瑩上了一份公文，名為〈雞籠破獲夷舟奏〉，文中對打敗英人有如下陳述：

奏為夷船攻擊雞籠礮臺，我兵擊沉英船一隻、杉板二隻，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斬馘白紅黑夷三十二人，奪獲夷礮圖冊，現提審辦，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⑨

這裡向道光皇帝陳述他們的戰功與戰果，並請皇帝諭示聖意。

除了公文外，處理個人生活事務的日常實用文也不少，不論書信、序跋、碑誌、哀祭皆有。嘉慶年間到臺灣擔任臺灣縣學教諭的鄭兼才，其《六亭文選》中就有許多日常實用文。如其與嘉義縣學教諭謝金鑾的私人書信就有四封，此外又有序跋、壽文之作。另一遊宦文人周凱，在道光十三年時擔任臺灣道，其《內自訟齋文選》中，也有許多日常實用文，其中光書序就佔了一半的數量，此外又有壽文、碑誌，整部文集幾乎都是日常實用文。以下略引兩篇文章以為說明，鄭兼才〈與退谷〉一文云：

臺灣當兵燹之餘，孤懸海外，綏輯安撫之計，足以重當路憂，而不可旦夕寬，誠有十倍於臺志者。然閣下與兼才之官，固學官也，其責任不足以繫海外之安危，而實有關於邑乘之興廢。孔子作《春秋》，謂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志之修，亦猶是也。固關治理之大，而為閣下見諸行事之書也。^⑩

這篇文章是鄭兼才寫給謝金鑾（字退谷）的信，當時謝金鑾撰述《續修臺灣縣志》一書，此信所談，即撰寫志書之事，認為謝氏撰書之心，和孔子撰寫《春秋》一樣，具有偉大的抱負。

再看周凱〈嘉義王君墓誌銘〉一文：

君八歲喪父，第三歲，母氏許，節守撫之。幼端謹，能率弟讀，皆入學為諸生。性孝友，重然諾，好施與。凡鄉里事，身為之倡，鄉里皆倚君一言為重。^⑪

⑨ 姚瑩：《東溟奏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卷2，頁32。

⑩ 鄭兼才：《六亭文選，俞瘳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卷3，頁75。

⑪ 周凱：《內自訟齋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45。

這段引文，是周凱為嘉義王朝清所寫的墓誌銘，文中敘述朝清幼年喪父，由寡母許氏撫養長大，並談及他性格上的優點，以及為鄉里所重的情形。

以上分別介紹了公牘文與日常實用文，由是可知，清代臺灣遊宦文人的實用性散文甚多。這些實用性散文，除了方才介紹的幾本文集中可以見到，在其他的別集以至於總集中亦常能得見，如施琅《靖海紀事》、藍鼎元《東征集》、姚瑩《中復堂選集》、鄧傳安《蠡測彙鈔》、丁曰健《治臺必告錄》、王元禛《甲戌公牘鈔存》、劉璈《巡臺退思錄》、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海防檔》、《法軍侵臺檔》……等等也有許多的篇章。除了文集之外，方志中亦保留了為數不少的作品。細審實用性散文之所以流行於遊宦文人的作品中，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官方身分與社會地位。因為當官，所以公文往來十分頻繁；因為社會地位高，所以為他人作序跋、碑誌、壽序、哀祭的機會便多，這是人情往來所無法避免之事。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收有實用性散文之別集一覽表

作者	書名
施琅	靖海紀事
陳瓚	陳清端公文選
藍鼎元	東征集
鄭兼才	六亭文選
姚瑩	東溟奏稿
姚瑩	中復堂選集
鄧傳安	蠡測彙鈔
周凱	內自頌齋文選
徐宗幹	斯未信齋文編
沈葆楨	福建臺灣奏摺
吳贊誠	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
劉璈	巡臺退思錄
黃逢昶	臺灣生熟番紀事
劉銘傳	劉壯肅公奏議
楊岳斌	楊勇愨公奏議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收有實用性散文之總集一覽表

編者	書名
六十七	使署閒情
丁曰健	治臺必告錄
王元樞	甲戌公牘鈔存
未明	臺案彙錄（甲、丙、丁、戊、己、庚、辛、壬集）
未明	臺灣教育碑記
未明	雍正硃批奏摺選輯
未明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
未明	淡水廳築城案卷
未明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
未明	臺灣海防檔
未明	法軍侵臺檔
未明	臺灣關係文獻集零
未明	清季臺灣洋務史料
未明	清季臺灣外交史料選輯
未明	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未明	清季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
未明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

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收有實用性散文之方志（含採訪冊）一覽表

著者	書名	備註
高拱乾	臺灣府志	
周元文	重修臺灣府志	
周鍾瑄	諸羅縣志	
陳文達	鳳山縣志	未收公牘文，只收日常實用文。
陳文達	臺灣縣志	
劉良璧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范咸	重修臺灣府志	
王必昌	重修臺灣縣志	未收公牘文，只收日常實用文。

余文儀	續修臺灣府志	
王瑛曾	重修鳳山縣志	
胡建偉	澎湖紀略	
謝金鑾	續修臺灣縣志	
蔣鏞	澎湖續編	未收公牘文，只收日常實用文。
周璽	彰化縣志	
陳淑均	噶瑪蘭廳志	
柯培元	噶瑪蘭廳志略	
陳培桂	淡水廳志	
林豪	澎湖廳志	
沈茂蔭	苗栗縣志	未收公牘文，只收日常實用文。
鄭鵬雲	新竹縣採訪冊	
盧德嘉	鳳山縣採訪冊	
鄭鵬雲	新竹縣志初稿	

案：以上文集或方志中所收的實用性散文，在公牘文的部分，大致以疏、奏議、檄移、上書、露布爲主；日常實用文的部分，則以碑記、序跋爲主。

（二）情感內涵之特色

1. 羈旅異鄉之情

由於遊宦文人的祖籍地並非臺灣，來臺灣任官只是暫時性的工作，任期屆滿便會調回大陸，所以在臺灣居住的日子，純粹是羈旅生涯，也因此作品中常透露客居異鄉、抑鬱不舒的情感。如高拱乾〈澄臺記〉一文，記述作者之所以建造此臺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抒發他旅臺爲官的鬱悶心情。其文曰：

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宴息之所。耳日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四顧隱然，無以宣洩其懷抱。¹²

¹²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臺灣史料集成本），頁479。

這段話說到他來臺任官的抑鬱心情，這是客居異鄉的正常現象，正如許多阿兵哥到外島服役亦是如此，此固人情之常。正因為有此鬱悶心情，所以作者建築澄臺，希望藉由勝景的陪伴以消解思鄉的愁緒。他說：「與客登臺以望，不為俗累，不為物蔽，散懷澄慮，盡釋其絕域棲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則斯臺比諸凌虛、超然，誰曰不宜。」¹³文中說他常和客人登上澄臺欣賞景色，以化解鄉愁。文末並以澄臺與東坡在密州任官時所建的「超然臺」相比附。我們都知道，蘇東坡之所以到密州任官，是因為得罪王安石而被貶謫，心境上實在十分無奈與不平，今作者以澄臺比超然臺，正是以自身比作東坡，則其羈旅臺灣的心境如何，也就不言可喻了。

接著來看郁永河《裨海紀遊》一文：

再觀城市景物，憶半載處非人之境，不啻隔世，不知較化鶴歸來者何如？余向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目極蒼茫，足窮幽險，而所謂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縱有閩苑蓬瀛，不若吾鄉激濼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吾思也。

此處談到他來臺灣採硫半年多，歷經幽險，而且百姓「裸體文身」，缺乏教化，讓他感覺如處「非人之境」。接著話鋒一轉，他開始想念故鄉，認為臺灣「不若吾鄉激濼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吾思也。」濃郁的鄉愁，流注筆端。

翟灝〈倭硫磺花記〉一文，也是一篇具有深切鄉愁的作品。此文描寫作者任職新莊時，經一樵夫的引導獲得一只硫磺花，此花色白如雪，又能變換顏色為松綠，樵夫稱此為百年難得之奇物。作者有幸獲得此花，卻忽然心生感嘆說：

一物之出於山也，且有遇不遇之感，而況於人乎！抱負非常，置身窮谷間，所遇不偶，而淪落以終身，可勝道哉！可勝慨哉！¹⁵

這段話是典型感物言志的寫法，作者從硫磺花的際遇聯想到自己的遭遇，

¹³ 同上。

¹⁴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卷下，頁42。

¹⁵ 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6。

感嘆自己具有崇高的理想抱負卻任職於臺灣，羈旅異鄉，這是多麼令人感慨的事啊！

自古以來在古典文學的作品中，抒發羈旅鄉愁的作品便多，文人離開自己的故鄉到遠方任職或遊歷，大抵存在著一種飄泊失根的感覺，此時為文寄託愁悶之思，亦理之當然。因此除了散文作品外，在臺灣遊宦文人的詩歌中，也有許多傳達鄉愁的篇什，可以相互參照觀看，當更能了解此一文學題材之內涵。

2. 經世濟民之情

由於遊宦人士具有官方身分，不論是官員或幕府策士，本身職責都在於治理臺灣、經營臺灣，所以他們的作品中經常流露出經世濟民的情懷。希望能使臺灣的建設更進步，使臺灣百姓的生活更安定。例如陳瓚〈媽祖宮求雨文〉云：

庚寅之秋，渡海登岸，即投宿神廟，私心默誓，以為斷不敢苟取分文，但得地方晏寧，免致讐咎，神賜已多，豈不神之聽之乎？兩載以來，雨暘時若，年獲順成者，孰非邀神之福？某固敬誌不敢忘。何期入夏以來，雨澤愆期，今去立秋甚邇，早暵如故，此真小民災患切身之日也。政有闕歟？官失職歟？訟不得平，刑過其中歟？鰥寡廢疾不得養歟？有一於此，皆足致旱，吏之罪也，於民何辜。其或地方之蠹棍未除？在位之貪殘未去？此尤方面大吏之責，請神鑑顯殛，為小民大洩其憤，何為久旱不雨，重困我民為也？敢乞神恩，立收炎火，普降雨澤，俾民得耕種及時。秋收攸賴，但得利民，凡百殃咎甘受，某身不悔。⑯

陳瓚在康熙年間兩度來臺任官，他是一位盡忠職守的好官，不僅自身品行端正，對於百姓更是體恤有加。在他第二度來臺任官時，臺灣發生大乾旱，眼見秋穫時節已到，但「雨澤愆期」、「早暵如故」，如此勢必影響百姓的收成。陳瓚於是前往媽祖宮（明寧靖王府改建之大天后宮，在今臺南市）祈雨，希望媽祖保佑普降甘霖以解百姓之苦。文中對於老天爺遲遲不雨，作者也深自反省，認為這是地方官員有虧職守所致，所以作者也真情地向上

⑯ 陳瓚：《陳清端公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37。

蒼表白，如果能即時地普降甘霖，解決百姓的問題，即使上天要施加責罰，他也願意承受，且不怨無悔。這樣的一篇文章，讀來令人動容，充分展現出疼惜百姓而自願受苦的菩薩心腸。

清代民亂及族群械鬥層出不窮，造成社會極大的不安，百姓生活連帶受到劇烈的衝擊，許多遊宦文人為文表達心中的關切，例如藍鼎元〈檄臺灣民人〉一文：

檄告臺灣民人：土賊朱一貴作亂，傷害官兵，竊據郡邑。汝等托居肘下，坐受摧殘，無罪無辜，化為醜類，深可憐憫。本鎮總統大兵，會同水師提督施剋期剿滅，為汝等蕩滌邪穢，共享太平。非有立意殺戮，苛求於百姓之心，汝其自安無畏。¹⁷

這是一篇檄文，主要是為征討朱一貴而作的。文中希望百姓不要恐慌害怕，因為軍隊的征戰是針對叛賊，而非善良百姓，是為了「蕩滌邪穢」，而非「立意殺戮」，從這段話中可以充分感受到藍鼎元對於安定社會民心的用心。

接著來看岑毓英〈籌賑澎湖片〉一文：

臺灣府屬之澎湖地方，前遭颶風，百姓所種花生；地瓜，根葉霉爛，餬口無資。……據臬司張夢元面稱：由臺灣交卸旋省，道經澎湖，目睹各島饑民甚眾。該饑民等紛紛哭訴，深堪憫惻。臣查澎湖地土瘠薄，戶鮮蓋藏，此次被災嚴重，饑民竟有八萬餘千之多，嗷嗷待哺，亟應設法賑濟，以免流離失所。時督臣何璟巡閱營伍，尚未旋省。臣與司道商籌，由省城增廣義倉穀項下，提陳穀二萬石碾米，陸續裝輪船運往澎湖。並飭臺灣道遴委委員前往，會同澎湖通判鮑復康，確查各島饑民，實有若干，分別等第，妥為撥給，以仰副聖主子惠元元之至意。至動撥倉谷，仍籌款買補還倉，除陳易新，以屬兩便。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鑑訓示！謹奏。¹⁸

岑毓英當時在福建撫部院任職，眼見澎湖因颶風所襲而歉收，因此寫下這篇公文，希望朝廷能趕緊撥款輸糧以賑災，讓八萬多個災民，免於「流離

¹⁷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卷1，頁4。

¹⁸ 收錄於林豪：《澎湖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卷12，頁397-398。

失所」。此文情深意切，視民猶親，真正展現出地方官對於百姓的憐愛，與前頭所舉陳瓚之文，實相互輝映。

再看婁雲〈義渡碑記〉一文：

余嘗三至臺瀛，從事於師徒戎馬間，周歷南北，見夫曲溪陂澤不可以梁，病於濟涉之處甚多。迨丙申，承乏淡水，所屬綿互幾四百里，所謂曲溪陂澤，不可以梁者，不可悉數。其間土人駕舟以濟，相安於定章者弗記。惟大甲溪塊石層疊，支派雜流，水勢西衝，直入大海，遇春夏盛漲，極目汪洋，誠險道也。此外，如中港、房裡、柑尾，雖險阻稍減，然或溪面廣闊，或急湍洶湧，皆迫鄰海汊，亦危險莫測也。此數處非無駕舟侍濟之人，大率土豪撐駛，藉索多貲，少不如願，即肆剝掠有之，行旅之受害也久矣，義渡其容緩歟？……爰集紳士、郊商、耆宿，而諭以意，且先捐廉以為之倡，乃無弗踴躍樂輸。不數旬，共捐洋銀八千九百餘圓，其不敷者，則搜羅充公租穀以足之。更於四要溪外，若井水港、鹽水港，一律設渡，共凡六處。……並將籌議置舟、選夫、歲修工食一切章程，存諸案牘，詳明各憲，勒石以垂永久。今而後，勞者安，利者普矣。¹⁹

婁雲，浙江省山陰人，道光年間由惠安知縣調任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官，任內平息閩粵械鬥、置社倉、修明志書院，並設置義渡，政聲遠播。此文記載了婁雲設置義渡之緣起與過程，當時他看到臺灣許多河川的水勢湍急，百姓無法順利渡河，許多擺渡的船家趁此機會勒索，百姓只能忍氣吞聲地遭受無理剝削。於是他提出設置義渡的想法，由政府出面進行管理，讓百姓可以免費過河。然而設置義渡需要人力與財力，於是婁雲帶頭勸募，並率先捐款以為提倡。在婁雲大力號召下，終於得到各方響應，義渡也順利創設完成，嘉惠無數的百姓。流寓文人吳子光就曾針對婁雲設置義渡之事，寫下〈淡水義渡記〉一文，以資紀念，其勤政愛民的形象，由是可見。

清末是臺灣社會動盪激烈的時候，當時列強對臺灣的侵擾屢見不鮮，臺灣每逢戰亂，常需從內地派兵增援以解兵厄，此時在臺灣任職的文人，便常行文朝廷以求奧援。如光緒十年八月時，法軍攻擊臺灣，當時巡撫劉

¹⁹ 收錄於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230。

銘傳督軍抗敵，獲得勝利，但隨後法軍再度聚集，並加強攻勢，臺灣不論是兵力或糧餉，都極為窘絀。劉銘傳擔心法軍發動全臺攻勢，不僅攻北部，可能也會進軍南部，於是寫了〈密陳臺疆危迫援餉俱窮片〉向朝廷求援，該文云：

彼族（法軍）大隊，俱集於斯，基隆四山，皆築鐵營，勢非得全臺不止。我軍苦戰，傷病死亡，器械、藥丸，無能為繼。……敵人若攻臺南，則四路斷絕，南北洋之船，又不能遠來臺地，坐而受困，援救伊誰？臣一身不足惜，將使全臺千萬生靈，盡罹塗炭，能不寒心。……敢乞宸謨，廣施方略，以中原全力，救此危疆。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附片密陳，伏求聖鑒。²⁰

文中充滿拯救臺民的懇切心情，希望朝廷能迅速增援以保全臺灣，其中所謂「臣一身不足惜，將使全臺千萬生靈，盡罹塗炭，能不寒心。」充分展現了朝廷命官對於黔黎百姓的責任與關懷。

從以上所引數篇文章來看，遊宦文人由於具有官方身分，因職責之故，其作品常展現經世濟民的情感，對於社稷、對於民生，流露著比常人更深的憂慮感，希望透過種種的方式使社會更安定、百姓更和樂，這是職務影響作品內容的必然結果。

（三）文化觀點之特色

在清代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中，如果從文化觀點上來看，它具有「反映上國文化優越心態」的特色。當時臺灣是一化外之地，雖然明鄭時期已有沈光文傳播文學、文化，又有陳永華倡建孔廟以興學，但畢竟時日至短，臺灣文化的深度終是難以和中國大陸相比，在此一情況下，清代遊宦文人便經常有意無意地在散文中表達出上國文化的優越感。例如藍鼎元〈紀荷包嶼〉一文，此文談到他路過嘉義縣荷包嶼的感想，他認為荷包嶼很美，有山有水，宛如世外桃源，環境甚至比杭州與惠州的西湖更美，於是他興起了居住在荷包嶼的想法，他說：

余生平有山水癖，每當茂林澗谷，奇峰怪石，清溪廣湖，輒徘徊不忍去，慨

²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卷3，頁180。

然有家焉之想。……杭州繁華之地，惠州亦無曠土，水沙連又在番山，皆不得遂吾結廬之願，如荷包嶼者，其庶乎？建村落于嶼中，四面皆水，環水皆田，艤舟古樹之陰，即在羲皇以上，釣魚狩獵，無所不可，奚事逐逐於風塵勞攘間哉？²¹

這裡透露出作者想居住於荷包嶼的殷切心情。然而作者最後有無定居於此？答案是否定的，原因為何呢？他說：

所恨千里重洋，僻在海外，不得常觀光上國，恐子孫渺見寡聞，如夜郎之但知自大。是則可憂也，姑紀之，以志不忘焉。²²

作者認為，臺灣地處海外僻遠之地，無法經常「觀光上國」（至中國遊歷），如此子孫可能會「渺見寡聞」、「夜郎之但知自大」，所以他還是放棄了定居在荷包嶼的想法。

從以上引文明顯可以看出，遊宦文人抱持著中原文化的優越感，認為臺灣畢竟是化外之地，難以和中國大陸相比。這種文化優越感的產生，其中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來自於對原住民文化的輕視。如郁永河《裨海紀遊》云：

野番恃其獷悍，時出剽掠，焚廬殺人，已復歸其巢，莫能向邇。其殺人則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髑髏，加以丹堊，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推為雄，如夢如醉，不知向化，真禽獸耳！²³

以上引文，乃作者採硫時看到原住民殺人取首之感想，文中並直斥原住民為禽獸。接著再看翟灝〈生番歸化記〉一文，其文曰：

又有玻璃番，聞其人甚秀美，然其地遠而莫致，彼亦不出。外此，則傀儡、雞爪，各種不一。率皆穴地而居，射鹿為活，衣不蔽體，略具人形，深處窮島，絕跡人寰，所謂化外之民，禽聚而獸行者也。²⁴

²¹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卷6，頁89。

²² 同上註，頁90。

²³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卷下，頁33。

²⁴ 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7。

此處也是對原住民文化的鄙視，認為他們「穴地而居」、「衣不蔽體」，是「化外之民」；甚至說他們只是「略具人形」，「禽聚而獸行者也」。郁、翟二氏的說法，凸顯了一種上國文化的優越感，他們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鄙視，正是這種優越感作祟使然。由於存在著文化上的優越感，視原住民文化為次等文化，所以清朝官員無不用盡心思，希望漢化原住民，於是倡設社學，企圖提升原住民的文化水平。如黃逢昶〈化番俚言〉云：

復設立番學，延請蒙師，拓置番童，教之以讀書識字，使爾等沾染聖教，沐浴皇仁，盡為熙朝赤子。惟念爾等番眾，於人情物理，懵然無知，即蒙師手示口言，亦恐不能詳盡，因擬化番俚言三十二條，刊刷成本，頒發爾等各社、各學，以便逐日觀覽。²⁵

此處談到原住民「於人情物理，懵然無知」，所以除了設學施教外，還得另立〈化番俚言〉三十二條，以加速文化素質的提升。再看劉璈〈開山撫番條陳〉所云：

生番梗化，端由語言文字之不通……欲通語意，自非就番設學不可。……語意稍通，再授《四書》，漸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及利用、厚生、法制，一切反覆訓戒，以收野心，而端治本。²⁶

所謂「生番梗化」、「以收野心」，都流露出對於原住民文化濃烈的輕視意味，正因如此，所以要「就番設學」、「反覆訓戒」，以端治本。

從上述引文可以得知，遊宦散文中時常流露出對臺灣文化的輕視，以及對中原文化自尊、自貴的心態。這種有意無意之間顯現出來的上國文化之優越，對於臺灣文化實已造成嚴重且劇烈的傷害，尤其是對於原住民文化而言，更存在著許多難以撫平的傷痛。

²⁵ 黃逢昶：《臺灣生熟番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37。

²⁶ 劉璈：《巡臺退思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2。

三、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的影響

(一) 擴大中原人士對於臺灣的認識

臺灣在明鄭時期正式被來自中國的政權接收，當時中原人士對臺灣幾乎毫無所悉。清康熙年間臺灣歸入清朝，當時清廷認為臺灣不具價值，一度想棄守臺灣，他們認為：「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²⁷從這樣的說法可以看出清廷對於臺灣的陌生與漠視。後來經過施琅、李蔚、蘇拜等人的說項，清廷才著手經營及管理臺灣。

中原人士對於臺灣的陌生，當然不利於臺灣的治理，畢竟要能和諧相處，就必須了解彼此的狀況，才能加速交流與促進融合。在這種情況下，臺灣遊宦文人所寫的散文作品，就成了中原人士認識臺灣的一項利器了。首先是遊宦文人的公牘文，這些公文是臺灣官員和朝廷互通訊息的資料，臺灣大大小小的事物經常透過這些公文呈報給大陸的長官或皇帝；這也就是說，在大陸的官方高層，實際上是透過這些公文來掌握臺灣政情的。除了公文外，許多日記式散文、筆記式散文或個人文集，載述了遊宦文人在臺灣的所見所聞，這些散文作品也成為中原人士認識臺灣的一項管道。例如鄭際唐為朱景英《海東札記》作序時說道：

（臺灣）其土俗民風，載郡邑志者，亦屢經修輯，而覽者猶有弗全、弗備之憾。……觀研北（景英之號）是編，島夷之延亘，風濤之險夷，不待按圖，瞭然在目前。其地田畝、軍營，下及鳥獸、卉木，鉅細悉具。²⁸

此處談到朱景英所作的《海東札記》，對於臺灣的地理形勢、民風節候、鳥獸草木皆有載述，讓人不需藉圖查索，也能一目了然，事事物物如在眼前。這說明了臺灣宦遊散文，具有促進中原人士了解臺灣、認識臺灣的積極作用。再看魯仕驥的〈小琉球漫誌序〉：

²⁷ 引自郝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卷下，頁31。

²⁸ 收錄在朱景英：《海東札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3。

（臺灣）雖屬內地，而巨洋隔之，學士足跡，無從而至。其四方之商賈於是者，既不足以知之；而官斯土者，政事卒卒，又或未暇筆之於書。是以八十餘年，恫恍迷離，其詳不得而著也。今先生（朱仕玠）以散秩優游其地，得以用其精心考核，而成此書。此書之成，既足以見聖朝覆幬之仁，不遺荒徼，且使讀是書者，洞悉其人情土俗，他日或仕其地，知所法戒，而因以施其撫治之方。²⁹

此處談到，臺灣因為遠隔重洋，所以中原人士對於臺灣的印象「恫恍迷離，其詳不得而著也。」幸好有朱氏《小琉球漫誌》一書，能使人「洞悉其人情土俗」，以便讓日後到臺灣任職者能夠「知所法戒」，施以「撫治之方」。這段話也說明了遊宦散文對於促進中原人士了解臺灣的正面作用。接著再看翟中策為翟灝《臺陽筆記》作序時所說的話：

臺陽（指臺灣）孤懸海外，遠隔重洋，周穆馬跡未嘗至，東山屐齒未之經，不意得笠山筆記（指《臺陽筆記》），如置我於海嶼沙島之中，而一一觀其態狀也。³⁰

作者在文中談到，臺灣遠隔重洋、人跡罕至，他有幸能閱讀《臺陽筆記》一書，感覺好像置身於臺灣島中，觀賞島上各類事物的情態。再看毛大周為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所作之序：

夫彰乃閩之臺灣，古毘舍耶國。近以我朝德威遠播，始入版籍。其地島嶼，孤懸波中，城市獨闢，海表山川既殊，風土亦異，民情物產，均多不侔內地。董君宦遊斯土，實有得於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乃退而編輯成書。凡臺地疆輿、官守、土俗、民風、山珍、水利之類，以及詩詞歌曲，靡有不備，彙為四卷，顏曰《臺海見聞錄》。……余披閱之下，神遊其境，覺蛟室蜃樓之形，儼遇於目；濤鳴海吼之聲，恍棲於耳。山川風土，一覽洞然。不啻以董君之見聞，據為余之見聞矣。³¹

²⁹ 收錄在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3。

³⁰ 此序收錄於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5。

³¹ 此序收錄於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3。

此處作者說道，當他閱讀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時，彷彿神遊於臺灣，臺灣的山川風土，他「一覽洞然」。最後他甚至說，讀過此書後，感覺書中的事物不只是董天工看過，好像自己也親身經歷過。

由以上所舉四篇序文可知，許多中原人士無緣親自遊歷臺灣者，往往透過臺灣遊宦散文一窺臺灣的面貌。因此我們可以說，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作品，對於促進中原人士之了解臺灣，具有明顯而積極的作用。

（二）促進臺灣政教的推動

臺灣本是化外之地，自明鄭設官經營推動教化以來，文化始逐漸扎根。然而明鄭治臺時日甚短，臺灣接受中國文化的陶冶，大抵奠基於清代。清朝治理臺灣可說是千頭萬緒，在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地方推動政教，的確備極艱辛。而在這個推動的過程中，遊宦文人的散文作品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民情的上傳以及長官諭令的下達，在在需要使用散文書寫。所以清代臺灣古典詩歌數量雖然高出散文甚多，但在推動政教的用途上，散文實有不可取代之地位。這些推動政教發展的散文作品，主要是實用性散文，其中公牘文與日常實用文皆有。

以公牘文而言，由於是官員間往來的文書，所有政情、政令的傳達，均有賴於此。所以臺灣政事的推動，此類散文功不可沒，以下且援舉數例，以為說明。首先來看施琅〈論開海禁疏〉一文，此文影響了臺灣的海禁政策。當初清朝治理臺灣時，本欲大開海禁，但施琅以為不可，遂以此文奏請朝廷設限管制，康熙於是頒布渡臺禁令三條，以限制人民渡海來臺。再如藍鼎元〈請權行團練書〉、〈請行保甲責成鄉長書〉二文，促成臺灣在康熙六十年時推行保甲與團練制度，以安靖地方，消弭動亂。又如沈葆楨〈請移駐巡撫摺〉一文，此文作於清同治十三年，當時臺灣與日本發生糾紛，沈氏受命至臺善後，當時他上了此封奏摺，建請朝廷讓福建巡撫移駐臺灣，以便就近管理。當時朝廷採取折衷辦法，讓福建巡撫夏、秋二季留福建，冬、春二季留臺灣。除了上述引述的數篇文章外，其他影響臺灣政教推動的散文仍多，如徐宗幹〈全臺紳民公約〉，諭示臺灣百姓團結抵抗以英國為首的列強侵略；劉銘傳〈籌議臺灣郡縣分劃添改裁撤以資治理疏〉一文，促成臺灣的行政區域變成三府一直隸州；邵友濂〈擬請移設臺灣省會以定規模摺〉，建請臺北成為臺灣省會……等等，不勝枚舉。

有別於公牘文的推動政事，日常實用文的功用較明顯地表現在教化的

發揚上。根據前述，遊宦文人書寫最多的是碑記，其次是序跋、哀祭一類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的是宣揚教育或宗教的意義，有的是肯定詩文教化之美，有的則是歌頌先人德行，處處展現揄揚教化的作用。例如徐宗幹〈恭跋孝經正解〉，肯定了孝道的重要；王化行〈始建海會寺記〉，傳揚宗教之善；鄭兼才〈龜宅鄭氏續修族譜序〉，倡導家庭倫常之德；周凱〈嘉義王君墓誌銘〉，歌詠王朝清急公好義的崇高德行；康卓然〈重修臺灣縣學記〉，宣揚儒門教化之功。諸如此類的作品，俯拾皆是，均為臺灣教化的推動貢獻了可觀的力量。

（三）引導後代臺灣古典散文的寫作

臺灣遊宦散文的作品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它對後代臺灣古典散文的寫作，卻起了引導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臺灣剛為清朝接收時，文化貧瘠，本地文人幾乎看不到，此時由遊宦文人扮演播種的角色，慢慢將文學帶進臺灣，本地的文人才逐漸興起。也正因有此過程，所以臺灣本地文人的創作模式實有淵源於遊宦文人之處；甚至在日治時期，來自大陸或是日本的文人，也在寫作形態上承襲了遊宦文人的作法。他們或者學郁永河《裨海紀遊》一類的日記式散文，如本地文人吳德功《觀光日記》、洪棄生《八洲遊記》，日治時期大陸文人施景琛《鯤瀛日記》、張遵旭《臺灣遊記》、邱文鸞《臺灣旅行記》、謝鳴珂《臺灣旅行記》等等。或者學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一類的筆記式散文，如本地文人林獻堂《環球遊記》，連雅堂《臺灣漫錄》、《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番俗摭聞》，駱香林《臨海隨筆》等，還有日治時期大陸文人劉範徵《臺灣旅行記》、日本文人佐倉孫三《臺風雜記》等等，都是筆記式散文的作品。至於學藍鼎元《平臺紀略》一類仿紀事本末體而成的敘事散文，則有本地文人思痛子《臺海思慟錄》、吳德功《戴案紀略》、《施案紀略》，洪棄生《瀛海偕亡記》、《中西戰紀》、《中東戰紀》等等。從這些資料來看，可以明白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作品，對於後代的臺灣古典散文發揮了明顯的引導力量，這當然與他們扮演文學播種者的角色有關。

（四）提供臺灣方志的撰述材料

中國的方志在明清時期，數量既多且精，臺灣方志傳承了此一精神，也發展得極為繁盛。方志的撰寫，必須掌握豐富的地方資料，在這個部分，

清代臺灣遊宦散文顯然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除了藝文部分提供許多散文作品供作收錄外，內容的撰述部分也有許多資料是來自遊宦文人的散文篇什。尤其方志的撰寫，每每有陳陳相因，抄錄前志的習慣，在此一情況下，只要某一散文作品被某一方志引用，底下的方志也常跟著引用，此時該散文對於方志的影響，就既深且遠了。以下我們打算援引幾筆資料，以證明此一情況。例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由於此書是郁氏親身見聞之載述，所以常被後代方志所引用，如其記述楠木的一段話說：

又有巨木裂土而出，兩葉始蘗，已大十圍，導人謂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筍同理。³²

此話被臺灣方志廣泛徵引，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雜記》云：

筍楠，山中有巨木，裂土而出，葉始蘗，已大十圍。老匠云：「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筍同理。³³

又《續修臺灣府志·草木》云：

楠木始生，已具全體，裂土而出，兩葉始蘗，已大十圍，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筍同一理也。³⁴

將以上兩部方志的文字和《裨海紀遊》相比較可知，除了文句次序被調換外，幾乎沒有明顯的更動。除了這兩部方志外，像《重修鳳山縣志》、《噶瑪蘭廳志》、《噶瑪蘭志略》、《淡水廳志》等等，也都是將這段話略作改易而加以徵引。

郁氏之書被徵引處極多，模式和上述例子相近，今不贅舉。我們接著來看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一書被徵引的例子。該書卷二〈習俗〉的部分，談到臺灣百姓生辰之禮俗云：

³²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卷中，頁25。

³³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臺灣史料集成本），卷19，頁660。

³⁴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卷18，頁617。

生辰，為紅麵食團，彼此饋祝，神佛誕日，亦用以為獻。取婦之家，親友製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簪珥肘酒為賀。³⁵

這段話被《重修臺灣府志》與《續修臺灣府志》所徵引。《重修臺灣府志·風俗》云：

生辰，為紅麵食團，彼此饋祝，神佛誕日，亦用以為獻。取婦之家，親友製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簪珥肘酒為賀。³⁶

此處文字與《臺海使槎錄》一模一樣，無所增減改易。至於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同樣一字未改地抄錄進來，因襲之深，可見一斑。

從以上所舉二例可知，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對於方志有著明顯的影響，許多遊宦散文被當作方志引用的材料，而且一引就是數部志書，影響不可謂不深。吳師福助曾做過清代方志徵引詩文的國科會計畫³⁷，據吳師統計，其中文的部分就有 230 家、953 篇作品被徵引；雖然其中有被重複徵引者，也有臺灣本地文人的作品，不全是遊宦散文，但其數量仍舊非常可觀。因此我們認為，臺灣遊宦散文對於方志的撰寫有著確切的影響，它提供了方志徵引、收錄以及撰寫上的參考作用。

（五）對臺灣原住民文化造成衝擊

中國長久以來，喜歡以文化之高低作為區分族群的基準。錢穆曾說：「中國人分別蠻、夷、戎、狄，並非指其血統之相異，乃指其文化之差別。」³⁸以文化之程度來區分族類，這其間帶著一份濃濃的優越感。中國向來以華夏之族自居，而以羌、氐、夷、蠻、狄、獠、獯……等等來稱呼邊陲地帶之族群。並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³⁹充分顯示對自我文化的肯定以及對其他族類文化之鄙視。這樣的心態，一樣反映到原住民的身上來。前文已討論過，清代遊宦散文中對於原住民的觀點每每帶著輕視的

³⁵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卷2，頁40。

³⁶ 范咸、六十七合著：《重修臺灣府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臺灣史料集成本），卷13，頁533。

³⁷ 此計畫名稱為《清代纂修臺灣方志徵引詩文研究》，為國科會89年度之計畫。

³⁸ 錢穆：《民族與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頁6。

³⁹ 見《春秋公羊傳》（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19，頁244。

成分，或指之為番，或詈之為禽獸。這種觀點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衝擊不可謂不深。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讓原住民對於自己的文化產生了自卑感，對自己失去自信。湯仁燕曾綜合許木柱等諸家的論點說道：

漢民族對自己文化存著一種迷思，並習慣以「漢族本位」來處理中國歷史上的族群關係，認為外族的漢化是天經地義的事。漢民族對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始終未能脫離強勢族群的主觀偏見，認為原住民社區生活貧窮、文化落後，充斥著各種負面的想法。原住民如欲爭取較高的社會地位，除了資格與能力的取得外，還必須對優勢的漢文化加以認同，在中國傳統的「華夷」世界觀及同化政策下，原住民傳統文化被破壞殆盡，原住民族群及其文化在不斷的受到貶抑下，「內我」完全崩解，因而不斷追問「我是誰？」在潛意識中普遍存在著自己屬於低劣民族的族群意識。^⑩

這是非常嚴重的傷害，代表著中國文化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非理性壓迫。而這樣的傷害，其源頭可追溯到統治臺灣二百餘年的大清王朝。清朝在觀念想法上輕視原住民族，認為他們的文化落後野蠻，因此需要努力學習漢族文化。陳龍廷對此分析道：

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所採取的基本政策，可以說是「文化主義」：這種國家政治體制下的儒家教化，似乎是一種虛假的平等主義，反對同一個時代存在不同文化的多元文化論。他們既然自認為屬於比較高級、優雅、有教養的文化，而異文化則屬於較低劣、粗糙、原始。由此推論，異文化的臺灣原住民當然必須努力學習比較優秀的儒家思想。^⑪

由於希望原住民努力學習漢族文化，所以從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開始，便在臺灣各地籌設社學，以供原住民讀書，他們的目的除了讓原住民學習漢文化之外，進一步還希望讓原住民徹底變成漢人。且看雍正年間擔任臺灣知府的沈起元，其〈條陳臺灣事宜狀〉一文的說法：

^⑩ 湯仁燕：〈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認同與學校教育重構〉，《教育研究集刊》第48輯第4期（2002年12月），頁82。

^⑪ 陳龍廷：〈相似性、差異性與再現的複製：清代書寫臺灣原住民形象之論述〉，《博物館學季刊》第17卷第3期（2003年7月），頁98。

至於今日，土地日闢，民人日增，熟番之知識日開，生番之氣息漸通，正須廉幹能員經理捱地，可以化流民為土著，化熟番為漢人，化生番為熟番。⁴²

在清朝這樣的觀念與作法下，原住民文化的流失與族群自尊的淪喪，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臺灣遊宦散文中對於原住民的批判、指責與鄙視，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傷害，已成為歷史性的傷口，有待於今日民主自由的社會裡用更包容、更尊重的心，以多元文化的新觀念、新作法，慢慢去撫平原住民內心的傷痛，並找回原住民對自我文化的肯定及信心。

四、結 論

這篇論文的論述內容，事實上來說範圍極大，很容易便落入難以全面探討的窘境。正因為題目的範圍極大，本文只處理主幹性的議題，至於較枝節細微的問題，或色彩不夠鮮明者，則略過不談。例如在「特色」的部分，本文僅從文學類型、情感內涵以及文化觀點等三方面進行探討，寫作技巧的部分則未有涉及，這主要是因為寫作技巧的運用，臺灣遊宦文人和其他身分的文人（中原內地文人、臺灣本地文人）的模式差不多，很難看出自我的特色，故略去不談。

除了分析臺灣遊宦散文的三點特色外，本文也從擴大中原人士對於臺灣的認識、促進臺灣政教的推動、引導後代臺灣古典散文的寫作、提供臺灣方志的撰述材料、對原住民文化造成衝擊等五方面進行分析，以探討臺灣遊宦散文的影響。經由本文的討論，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的大體面貌便有了概括性的呈現。從這些特色與影響中，我們可以得知，有許多的因素都是來自於遊宦文人本身特殊的職業身分與祖籍地所造成的。由於他們的身分是官員，所以實用性散文特別多，不論是公文或日常實用文皆有。另外，由於是遊宦身分，來臺灣多屬遊歷的情況，在居留日短，寫作講求速效方便的情況下，日記式、筆記式的作品隨之興盛；又因為祖籍地在大陸，所以作品也常常流露出羈旅異鄉的心情。這些現象的發現，讓我們了解到文學的發展確實與個人的特殊條件及外在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⁴² 收錄於《清經世文編選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頁2。

此外，臺灣遊宦散文的輪廓既已浮現，對於進一步探討本地文人的散文將具有可觀的協助力量，因為本地文人的寫作受到遊宦文人的啓蒙極大，存在著深厚的淵源關係，這是本文在研究上所能提供的另一項基礎價值。

然而儘管臺灣遊宦散文具有許多特色與積極性之影響，但其不足之處也相對地呈顯出來。例如其純粹寫景、記人、記事、狀物的單篇式記敘散文甚少，這部分散文常具備著濃厚的文學風味，此類作品的數量偏低，實在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此外，說理性散文在遊宦散文中數量亦少，這也是一個相當大的缺口。再者，實用性散文雖然數量極多，但也有偏於一隅的情形，它的公牘文非常多，至於日常實用文，則偏於碑記和序跋的撰寫，其他如書信、贈序、墓誌銘、壽序、箴銘等等雖有，但數量甚少，這也是一件可惜的事。總而言之，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雖然擁有一些特色，但仔細檢視之下，這些特色正透露遊宦散文的發展朝著某些特定的方向扎根，並沒有進行全面性的均衡拓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不得不懷疑它患了偏食的毛病，以致於營養失調，甚至可能有貧血的現象。這種情形，則待諸本地文人的興起才獲得某種程度的改善，例如說理性散文的部分，洪棄生、連雅堂、王則修在質與量上都非常出色。至於日常實用文部分，箴銘類散文在鄭用鑑的集子中存在不少；壽序類散文則施士洁、吳德功頗為出色；書信類散文則洪棄生最為秀異。至於記敘性散文的部分，純粹記人、敘事、狀物、寫景的單篇式文章也明顯增加，如洪棄生、吳德功、連雅堂、駱香林等都有許多優秀作品。這些臺灣本地文人一方面受到遊宦文人的啓迪，另一方面卻也填補了遊宦散文許多的罅隙，令人訝異與驚喜。這一部分的問題，筆者將另作專文討論，此處不再贅述。

這篇論文的最後，筆者想針對臺灣遊宦散文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衝擊提出一點呼籲，那就是幾百年前的封建體制下，文化的獨尊心態是可以理解與想見的，但是今日環境已走向多元民主的社會，對於其他族群文化的包容與尊重是必要而且急迫的，我們必須具有胸襟氣度去重視且關懷原住民文化，甚至加以學習和發揚。我們萬萬不能忽略一點，原住民才是這個島上最早的主人，他們的文化必須得到應有的地位與重視。

* 這篇論文的撰寫，吳師福助以及審稿委員都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和資料，在此謹致上最誠摯之謝意。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1. 翟灝（1958）。臺陽筆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 蔣師轍（1957）。臺游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 黃叔璥（1957）。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 朱仕玠（1958）。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5. 劉璈（1958）。巡臺退思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6. 朱景英（1958）。海東札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7. 劉銘傳（1958）。劉壯肅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8. 姚瑩（1959）。東溟奏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9. 周凱（1960）。內自訟齋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 黃逢昶（1960）。臺灣生熟番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 徐宗幹（1960）。斯未信齋文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 徐宗幹（1960）。斯未信齋雜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3. 董天工（1961）。臺海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4. 陳瓊（1961）。陳清端公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5. 鄭兼才（1962）。六亭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6. 沈茂蔭（1962）。苗栗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7. 余文儀（1962）。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8. 林豪（1963）。澎湖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 （1987）。清經世文編選錄。臺北：大通書局。
20. 郁永河（1987）。裨海紀遊。臺北：大通書局。
21. 藍鼎元（1987）。東征集。臺北：大通書局。
22. 高拱乾（2004）。臺灣府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23. 劉良璧（2005）。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24. 范咸、六十七（2005）。重修臺灣府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1. 陳必祥 (1987)。古代散文文體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 錢穆 (1989)。民族與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 馮永敏 (1998)。散文鑑賞藝術探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4. 謝崇耀 (2002)。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出版社。
5. 林淑慧 (2004)。臺灣文化采風：黃叔瓚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二) 期刊論文

1. 王更生 (1987)。論我國古今散文體類分合之價值原則及方法。孔孟學報，54，141-163。
2. 湯仁燕 (2002)。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認同與學校教育重構。教育研究集刊，48 (4)，75-101。
3. 許育典 (2002)。文化差異、多元文化國與原住民教育權。成大法學，4，37-69。
4. 陳龍廷 (2003)。相似性、差異性與再現的複製：清代書寫臺灣原住民形象之論述。博物館學季刊，17 (3)，91-111。
5. 林淑慧 (2004)。台灣清治初期古典散文的書寫策略－以藍鼎元、黃叔瓚的作品為例。臺灣文學評論，4 (4)，164-197。

(三) 學位論文

1. 林淑慧 (2005)。臺灣清治時期散文發展與文化變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A Study of the Prose Written in Taiwan by Officials From Mainland China During Qing Dynasty

TIEN, Chi-wen *

【 Abstract 】

The start of Taiwan litera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Late Ming dynasty. It reached the peak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nd developed into the modern times. During the Qing time, writing of the classical prose prospered and a large quantity of works had been created, with high quality. Among them, those written by officials from Mainland China prove to be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pros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ir works not only serve as a guide for Taiwanese writers to understanding classical prose style but also set up the criteria for later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prose written by Taiwanese writers. A grasp of their works can lead u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prose written in Taiwan. This article will thus characterize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writing by those official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local fellow writers of classical prose, so as to present better picture of how the classical prose in Taiwan developed and its merits and demerits.

Keywords: Taiwan literature classical prose Taiwan culture
Literature written by officials from Mainland China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Hsing-guo College of Management